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 包伟民／主编

《证类本草》与

宋代学术文化研究

周云逸 著



淮木

占斯

嬰音桃

鳩真陸切鳥毛

彼字

今新退一種

神農本草經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目錄



嘉祐補注本草藥品一千一百十八種
證類本草新增藥品六百二十八種
總一千七百四十六種



《证类本草》与

宋代学术文化研究



周云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 / 周云逸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6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包伟民主编)

ISBN 978 - 7 - 5201 - 0986 - 4

I. ①证… II. ①周… III. ①本草 - 中国 - 北宋 ②《

证类本草》- 研究. IV. ①R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3611 号

·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 ·

《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

著 者 / 周云逸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7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986 - 4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成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
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Q039）阶段性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 包伟民／主编

“唐宋史研究丛书” 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计划集编出版“唐宋史研究丛书”，下文谨述其缘起与基本思路。

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它是一个汇聚同好而组成的松散学术团体，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关于中国唐宋历史研究领域的发展。除了不定期地举办学术讲座、召开学术会议外，中心主要的事务是从2015年起编辑出版年刊《唐宋历史评论》。现今在此年刊基础之上，同仁们经过集议，认为有必要集编出版一套专门以唐宋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丛书。

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这套丛书可以将中心成员学术著作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团队”的总体力量。目前中心主要由本学院以及本校国学院从事唐宋史研究的教师组成，并聘有校外兼职研究员，经常参加中心学术活动的有20余人，还有已经毕业或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中心成员的学术兴趣涉及唐宋史众多领域，大致有政务文书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城市、财政、律令制度、宗教与民间信仰、历史文献、历史地理、医疾、民族关系、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辽金政治、地理、史学等多个议题。今后随着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推进，我们的研究力量与研究议题必然会不断扩充与拓展，用一套学术丛书来集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学术团队的合适途径。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的集编出版，反映了我们关于如何深化唐宋史研究的一些学术思考。《唐宋历史评论》“发刊词”曾指出：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兴起之新文化都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

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囿于一代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

所谓“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当然不仅仅是将习称之“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的两端扯到一起，让两个断代史领域叠加起来而已，而是希望推进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变，是如何从长时段“会通”地来观察历史的问题。

不同历史解释体系对于唐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转折似无异议。从明人陈邦瞻（1557～1628）所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①，到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认为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历史的“变革”^②，及至现今仍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唐宋转折”论，细节上虽多有差别，主旨却基本相同。

即便按照传统的、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都划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法，由于这个“封建社会”过于冗长，学者们也都试图将其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段，以便于深入讨论。他们有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也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但不管哪种分法，唐宋之际都是一个分界点。^③

从内藤氏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转折的具体内容做过许多侧重面略有差异的描述。陈寅恪（1890～1969）先生以“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④一语来概括唐代前期历史，最为精到。此外也有一些学界前贤，发表过一

①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第四册，第1191～1192页。

② 论文原载〔日〕《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10），黄约瑟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第10～18页。关于由内藤此文影响下形成的“唐宋变革”论，可参见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七期，1979年5月。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③ 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④ 陈寅恪：《论韩愈》，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96页。

些相当有启发性的意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长时段、全方位观察视野的犀利目光。

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前贤的这些论断的影响，似乎更多地只体现在引导学者们去关注唐宋之间历史的变异与断裂，不管是称之为“变革”还是“转折”，都是如此。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现状是，虽然关于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的沿革与变化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但将这种常识落实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去，则还处在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集中表现在制度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从晚唐五代去追溯宋代制度的渊源，但真正“会通”的成果尚不多见。总体看来，唐与宋各自分为两个“断代”局面未见有大的改观，中间那道隔离墙并不易被拆除。

唐宋两朝研究各自囿于断代史畛域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出于历史文献过于庞驳、史事制度过于复杂，以致多数学者以一人之心力，难以兼顾，而在于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常常局限于一朝一代，未能拓展开去。我们强调应该跳出断代史的框架，摆脱一时一地的局限，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也绝非以为凡叙述某一史事，都必须从唐到宋，甚至更长时段地，跨朝越代，从头说到底。实际上，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绝大多数专题，都不得不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断代”的某些侧面，跨朝越代式的史事叙述，对于不少学者来说，无论在精力上还是智力上，都是不太容易应对的挑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以一种会通的立场、眼光与方法去分析处理断代史的问题。

所谓“转折”，指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但是，假定了“转折”的存在，绝非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其两端相互割裂开来。毋宁说，基于对“转折”的认识，更要求研究者持有一种长时段、全方位的观察眼光，从历史前后期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入手，来讨论造成“转折”的种种因素，分析“转折”的前因后果。

如果未能明了赵宋以降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就不太可能真正理解韩昌黎（公元768~824）“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同样的，未能充分掌握中原地区古代服饰演变的全局，认清秦汉而下直至明清，含蓄收敛服饰风尚实为常态，倒是“非华风”的盛唐风范实属例外，仅以唐宋间的简单对比，来划出“开放”与“保守”的文化分

野，就未免流于世俗的片面之论了。笔者近年讨论宋代城市史，跳出传统的唐宋间产生所谓“城市革命”，亦即主要从历史的断裂层来做分析的思路，改为更多地观察唐宋间城市历史的延续性，小有收获，也可为一例。

所以说，如果能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前后转折的高度，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做观察，关于“唐宋转折”的假设不仅不会使我们将唐宋间历史机械地割裂开来，反而会更推动我们去探索它们相互间的有机联系，深化对它们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能带给研究者的丰厚回馈。

相对而言，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唐宋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历史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就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关注者看来更少一些。同样的，据我们对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粗浅观察，论者能跨越断代，将对史事的梳理上溯至唐宋者，似亦有限。因此，对于许多制度的沿革，史事的源起，常常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前贤的许多论述，例如前引陈邦瞻之语，接下去又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还有近人严复（1853～1921）之所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①。或者如王国维（1877～1927）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这些议论虽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多见引于学者的论著之中，但它们之所指出的历史现象，真正被学者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予以深入讨论的，则不多见。

易言之，鉴于学术史的现状，立足于唐宋的观察视角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可能推进对经由唐宋转折定型的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这样的贯通性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还是元明清，或者今天的中国，都是极为必要的。

所以，立足于“唐宋”的观察方法，不仅要求我们拓宽视野，将7～13世纪整个民族的历史活动纳入分析讨论的范围，更需要我们将观察的眼光从一代一朝、一时一地，拓展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它也必

①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信札，见《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第12页。

②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代金石家》，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将会对我们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纳而言，我们这套丛书以“唐宋史”为题，收录论著的具体议题自然不出唐宋两代的史事，而且多数仍不免分别讨论唐代或者宋代，但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则希望不仅要会通唐宋两代，关心的时段也比唐宋历史时期还要广泛一些。更重要的是，与其说这样的专题选择是出于一种学术领域的划分，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更合适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眼光的思考。我们希望以这种更具有透视力的学术眼光来自励，并希望以此为深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具体就丛书的集编组织而言，我们希望能够遵循学术研究的自然规律，不分批分辑，杜绝批量生产，同仁的论著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积以岁月，观以长效。同时，也欢迎学界同好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

谨此说明。

包伟民

2016年3月3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证类本草》之前的本草学史概述	15
第一节 唐之前本草学史概述	15
第二节 唐及五代本草学史概述	21
第三节 唐慎微之前宋代本草学史概述	27
第二章 《证类本草》的编撰	33
第一节 《证类本草》的编撰者唐慎微	33
第二节 《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	36
第三节 《证类本草》的版本	38
第四节 《证类本草》的体例	55
第三章 《证类本草》内容概述	64
第一节 《证类本草》收录的药物	64

第二节 《证类本草》征引的四部文献	76
第三节 《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	82
第四章 《证类本草》与北宋方剂学专著《太平圣惠方》	91
第一节 《证类本草》征引《太平圣惠方》的文献价值	91
第二节 《证类本草》征引《太平圣惠方》的谬误之处	102
第三节 《证类本草》征引《太平圣惠方》与今传本《圣惠方》 互参	108
第五章 《证类本草》与北宋训诂学专著《尔雅疏》	120
第一节 《证类本草》征引北宋邢昺《尔雅疏》考	120
第二节 邢昺《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考	127
第三节 北宋本草学与训诂学互动的意义	140
第六章 《证类本草》与南宋道教本草《丹房镜源》	143
第一节 集成本《镜源》征引《证类本草》条辨	144
第二节 集成本《镜源》抄录《证类本草》的证据及版本	158
第三节 据《证类本草》校正集成本《镜源》的谬误	160
第七章 《证类本草》与南宋史学家本草《通志·昆虫草木略》	162
第一节 《通志·昆虫草木略》的撰写旨趣	162
第二节 《通志·昆虫草木略》与《证类本草》的渊源关系	165
第三节 从《证类本草》看《通志·昆虫草木略》的价值与 谬误	173
第八章 《证类本草》引小说考	180
第一节 《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数量及特点	180

第二节 《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文献价值	184
第三节 《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失考之处	187
第四节 《证类本草》“以小说证药”与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	192
第九章 《证类本草》与《本草纲目》	194
第一节 《本草纲目》对《证类本草》的借鉴	194
第二节 据《证类本草》校正《本草纲目》举隅	196
第三节 从《本草纲目》看《证类本草》在本草学史上的价值	202
余 论 从《证类本草》看宋代学术的特点	205
附录一 《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唐慎微引书（篇）目录	208
附录二 《证类本草》药图中所见宋代道地药材目录	224
主要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5

绪 论

一 研究的意义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北宋著名医药学家唐慎微编撰的一部本草学著作，几乎涵盖了宋代以前本草学文献的主要内容，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巨著，开创了多项宋代本草学之最。

第一，《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药物种类之最。《证类本草》记载了 1749 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比之前北宋官修《嘉祐本草》新增了 628 种药品^①，是《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收录药物种类最多的本草学巨著。

第二，《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文献数量之最。《证类本草》征引文献多达 200 余种。书名所谓“经史证类”，指的是征引经史文献，作为本草的旁证，但实际上《证类本草》引用的不止经部、史部文献，还包括子部、集部文献，其中又以引用子部医家、道家、小说家文献为最。

第三，《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编



^① 蒙古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目录尾部有一长方形框（见上图），其中记曰：“《嘉祐补注本草》药品一千一百一十八种，《证类本草》新增药品六百二十八种，总一千七百四十六种。”笔者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统计，《证类本草》实际著录药物 1749 种。据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所述，《证类本草》现存各种刊本所载实际药数不尽相同，其差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个别药物的增删所致。

撰水平之最。唐慎微完善了“以方证药”的本草学写作体例。在唐慎微之前，本草著作很少在药物之后附加方剂。唐慎微在药物项下，续补了采自前人文献中的医方 3000 余首，使药物的用途、用法一目了然，切合临床实用，从而使“以方证药”成为本草学著作的重要撰写体例。《证类本草》在征引前人本草学著作时，明确标明出处^①，使许多前人的本草学著作通过《证类本草》得以基本保存^②。李时珍指出《证类本草》“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③。《证类本草》是在《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的编撰大量借鉴了《证类本草》中的材料。《本草纲目》虽然也收录了宋代之前的本草文献，但这些文献基本上是抄录自《证类本草》，属于第二手材料；而且李时珍征引文献大多不是直录原文，多有割裂、删减及合并，《本草纲目》在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上远不如《证类本草》。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指出：“12 和 13 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 15 和 16 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④

第四，《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的影响之最。《证类本草》是宋代最权威、最系统的一部本草学巨著。历朝修刊，并数次作为国家法定药典颁行，沿用五百多年，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曾用该书作为蓝本。《证类本草》有丰富的传本，在日本、朝鲜也有传播。在宋代，没有一部本草学著作能够像《证类本草》如此受到官方重视，且影响深远。也正因为《证类本草》影响深远，经过时间的淘洗，宋代诸如《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学著作都已亡佚，而《证类本草》流传了下来。

《证类本草》煌煌 60 余万言，在宋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属巨制，且是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十分不易。据宇文虚中的跋语可知，唐慎微是蜀地名医，他治病百不失一，“其为士人疗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

① 《证类本草》对于每一味药物，都用白色大字记《神农本草经》原文，用黑色大字记《名医别录》原文，《新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分别注以“唐附”“今附”“新补”等字样以示区别，墨盖子之下文字则为唐慎微续补的文献。

② 《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均已亡佚，今有辑复本刊行，其辑复的主要依据即《证类本草》。

③ （明）李时珍著，刘衡如校点《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第 8 页。

④ [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导论》，王铃协助，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 140 页。

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遂集为此书”^①。《证类本草》的编撰是唐慎微呕心沥血、集腋成裘之作，其征引的资料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和校勘价值，更为我们考察宋代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学术”一词古已有之，在宋代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南宋郑樵自称《通志·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通志·总序》）。所谓学术的范围不出经、史、子、集四部^②。文化的定义则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③所谓“学术文化”主要指基于方剂学、训诂学、道教、史学、文学等学术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邓广铭先生《论宋学的博大精深》指出：“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所达到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已往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④《证类本草》诞生于宋代学术文化环境中，其中必然体现宋代学术文化的特点。换言之，《证类本草》在本草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宋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证据之一。

本书在研究《证类本草》的编撰、内容及特色的基础上，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方剂学、经学、道教、史学、文学等学术文化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索《证类本草》的价值，揭示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这将有助于深化宋代医药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古代科技史的认识。

①（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印蒙古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本，第549页。

② 唐初官修《隋书·经籍志》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清代《四库全书》进一步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经部”指儒家的经典。经部之下又有小类。《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四库全书》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文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四库全书》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

③ 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1页。

④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428页。

二 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证类本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证类本草》版本的研究；二是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三是对《证类本草》药物的研究。四是对《证类本草》的校注。

（一）对《证类本草》版本的研究

北宋以来，《证类本草》存在多个传本系统。北宋大观二年（1108），艾晟校勘、刊刻《证类本草》，命名《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北宋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诏重新校定，更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王继先等奉诏重修，改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蒙古定宗四年（1249），山西平水（今山西临汾）晦明轩主人张存惠把寇宗奭《本草衍义》散入《政和本草》中，改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重修政和本草》，此版本写刻精雅，在平水刻书中，堪称甲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是目前学界使用最广泛《证类本草》的版本，笔者即以此版本为工作底本。

元、明、清三代出现了许多《证类本草》的翻刻本、校订本、节要本、改编本，形成了复杂的传本系统。《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包括《大观本草》传本系统、《政和本草》传本系统，这是学界的共识。但《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是否包括《绍兴本草》及其传本系统，尚存争议。冈西为人^①、马继兴^②、尚志钧^③描述《证类本草》传本系统时，都包括了《绍兴本草》传本系统。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李健、张卫、张瑞贤^④认为《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要素：具备序例、药物各论；各药内容包括《本草图经》药图、《嘉祐本草》的文本、《本草图经》的文本，以及唐氏增补“余药”内容和唐氏续添证类的部分。以此为据，《绍兴本草》

① [日] 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创元社，1977。

②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③ 尚志钧：《〈证类本草〉版本概述》，《基层中药杂志》1989年第4期。

④ 李健、张卫、张瑞贤等：《〈证类本草〉版本系统划分依据探讨——兼论〈绍兴本草〉与〈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系统的归属》，《中华医史杂志》2012年第4期。

并非《证类本草》传本。李健^①认为22卷本《绍兴本草》与《证类本草》原书有着较大的差别，不仅体例、卷次与《证类本草》截然不同，而且其药物的内容与《证类本草》亦有很大的差别，其内容一部分是依照《证类本草》摘引，一部分为“绍兴校定”的内容，此两部分内容大约各占50%，故其与《证类本草》原书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22卷本《绍兴本草》仅是《证类本草》派生的本草著作，而不应归属于《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绍兴本草》现仅有日本抄本存世，且为残本。郑金生、马继兴^②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绍兴本草》日本抄本进行了考证。万方^③研究了《绍兴本草》的校定编撰年代、卷数、所载药品数、所用底本及编撰整理者等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绍兴本草》的版本情况。

关于《证类本草》在日本、朝鲜的传播的情况，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④有详尽介绍。崔秀汉^⑤介绍了《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在朝鲜的传播情况。姚大勇^⑥探讨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朝鲜的流传及影响情况。

关于《证类本草》在明代的版本情况，王筠默^⑦考证出明刊《证类本草》有十余种。李健、张瑞贤^⑧则指出明代坊刻《政和本草》普遍存在错讹、粗滥现象。

学界前贤对《证类本草》的版本情况，辑录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收录《大观本草》《证和本草》《绍兴本草》的部分序跋、提要，并加上了丹波元胤考证的小字按语：“金皇统三年，宇文虚中跋云：‘元祐间，虚中为儿童时，先人感风毒之疾，慎微疗之。’乃为哲宗时人明矣。李东璧以为大观二年所著误也。艾晟序称不知何许人。若是同

① 李健：《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2009。

② 郑金生、马继兴：《神谷本〈绍兴本草〉的初步研究》，《中医杂志》1981年第2期。

③ 万方：《关于〈绍兴本草〉的几个问题》，《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④ [日] 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⑤ 崔秀汉：《朝鲜医籍通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⑥ 姚大勇：《〈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中医药文化》2012年第1期。

⑦ 王筠默《明刊证类本草的版本及其有关问题补记》（《江西中医药》1955年第7期）考证出明刊《证类本草》至少有五六种；经过搜集，王筠默《证类本草和本草衍义的几个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4期）又续得明刊《证类本草》数种。

⑧ 李健、张瑞贤等：《明代坊刻〈政和本草〉版本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11年第3期。